

N4A

历史不应忘记

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省新四军历史丛书

历史不应忘记

——纪念皖南事变60周年文集

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编委会

| | | | |
|-----|-----|-----|-----|
| 主任 | 王光宇 | | |
| 副主任 | 郑淮舟 | 李清泉 | 丁继哲 |
| 委员 | 卫道行 | 陈硕峰 | 凌云 |
| | 徐则浩 | 韩熙型 | 王传厚 |
| | 汪平慕 | 田式祖 | |

| | | | |
|-----|-----|-----|-----|
| 主审 | 凌云 | | |
| 主编 | 韩熙型 | | |
| 副主编 | 王传厚 | 田式祖 | 汪平慕 |
| 编辑组 | 韩熙型 | 王传厚 | 田式祖 |
| | 汪平慕 | 张铎 | 常其辉 |
| | 郑先福 | 毕长春 | |

责任编辑 杜宇民

装帧设计 郑先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不应忘记/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12

ISBN 7-212-01949-6

I. 历… II. 安… III. 革命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341 号

历史不应忘记

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099(传真)

E-mail:ahp0208@s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200 千

版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1949-6/K·504

定 价:14.80 元

印 数:00001-01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 |
|----------------------------------|----------------|
| 纪念皖南事变六十周年(代序) …… | 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1) |
| 铭记血写的历史 …… | 童小鹏(6) |
| 难忘的皖南事变 …… | 张钰秀(36) |
| 皖南事变亲历记 …… | 陈安羽(60) |
| 忆项英在被害前与我的几次谈话 …… | 马长炎(71) |
| 皖南事变与皖南地方党的斗争 …… | 孙宗溶(78) |
| 我在皖南事变中的艰难岁月 …… | 张志勇(95) |
| 接应皖南突围人员 …… | 胡德荣(105) |
| 从皖南事变到茅家岭暴动 …… | 祝增华(111) |
| 最近十年皖南事变研究回顾 …… | 施昌旺(118) |
| 毛泽东是怎样对待皖南事变的 …… | 徐君华(129) |
| 刘少奇与皖南事变 …… | 檀江林(137) |
| 皖南事变中的叶挺军长 …… | 马洪武(145) |
| 上饶集中营与皖南事变 …… | 蔡水泉(153) |
| 试析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在处理皖南事变中的 成功运用 …… | 高光智 卓爱平(161) |
| 皖南事变的发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国际背景 …………… | 朱超南 樊卡娅(168) |
| 皖南事变与国际关系 …… | 孙其明(176) |
| 赖少其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 …… | 曾 菲(189) |
| 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女兵 …… | 朱强弟(195) |

| | |
|-----------------------------------|------------------|
| 不应忘却的纪念····· | 唐锡强(203) |
| 钢陵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接应掩护新四军突围人员 ····· | 邢和明(209) |
|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分散突围与群众救援····· | 徐承伦(214) |
| 皖南事变前后莫斯科意见对毛泽东决策的影响····· | 刘以顺(221) |
| 皖南事变与国共力量消长····· | 卓爱平 陆文培(227) |
| 皖南事变对中间党派政治结合的推动 ····· | 张 勤 郝影利 樊卡娅(234) |
| 国民党地方当局与皖南事变····· | 蔡长雁(242) |
| 日本帝国主义与皖南事变····· | 辛 健(254) |
|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失败的军事地形因素探析····· | 曹天生(261) |
| 从皖南事变的所谓“军纪”问题看抗战时期的国共 关系····· | 李 强(267) |
| 后 记····· | (271) |

纪念皖南事变六十周年

(代序)

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2001年1月,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60周年纪念日。在皖南事变发生60周年之际,我们对蓄意制造这一亲痛仇快事件的国民党顽固派表示极大的愤慨,对在这一事件中遇难的新四军将士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不顾生命安危、千方百计地掩护新四军失散人员、帮助他们胜利突围的广大人民群众致以崇高的敬意。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新四军部队英勇拼杀,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在前往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无理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严格说来,皖南事变不是一场战争,而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利用他最高统帅的地位,布置陷阱,消灭异己。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就将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积极抗日转而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由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发展到军事限共为主、

政治限共为辅。1939 年底到 1940 年春,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华北地区向八路军发起军事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八路军打退后,国民党便将其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由八路军转向新四军。1940 年 10 月 19 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皓电”,强令新四军在一个月撤到黄河以北。12 月 8 日,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齐电”,一逼再逼,坚持“皓电”的无理要求。12 月 9 日,蒋介石悍然下达《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同时,蒋介石加紧秘密调兵遣将,在大江南北夹击奉命北移的皖南新四军。在江南,有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部队,在江北,有桂系一七六师等部队准备阻止皖南新四军渡江。由此可见,皖南事变这一亲痛仇快的事件,完全是国民党顽固派精心策划、一手制造的。这种背信弃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丑恶行径,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纪念皖南事变 60 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处理突发事件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能力。皖南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确定了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的正确方针。1941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8 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随即将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同时,中共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并且提出取消 1 月 17 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军民也强烈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八路军做好了随时配合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

的准备。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他打电话给国民党当局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义正词严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新华日报社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条亲笔题词,一条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条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这种坚决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接着,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蒋介石约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并没有达到摧毁共产党的目的,反而惊醒和教育了许多原来对其抱有幻想的人们,孤立了自己。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处理皖南事变这一突发事件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政策、策略掌握得当,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又顾全了抗战大局,把国民党蒋介石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充分表现了驾驭全局的卓越才能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处变不惊,紧紧抓住主要矛盾不放。当前,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死死抓住这个中心不放。只要抓住这个中心,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

在纪念皖南事变6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新四军将士不畏

强敌、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将士突遇强敌，众寡悬殊，仓促应战，但却表现了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和作风，表现了对党、对民族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在危急关头，叶挺军长身先士卒，亲临前沿，指挥战斗，表示要与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在东流山战斗中，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成营成团地轮番攻击，新四军战士个个像猛虎一样，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枪管打红了，就从敌人尸体堆里拣一支再打。阵地有几处被敌人突破，战士们就同敌人肉搏，有的在几个敌人的围攻下壮烈牺牲，有的干脆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部队被打散了，他们自动结合起来，突出重围。这种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现在和平建设时期，生死考验的形势不像过去那么严峻，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这是更严酷的考验，不少党员干部、甚至高级干部经不住考验而纷纷落马。因此，我们仍然要继承发扬新四军将士那种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纪念皖南事变 60 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皖南人民舍生忘死掩护新四军失散人员、帮助他们胜利突围的可贵精神。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艰苦奋战，弹尽粮绝，个个伤痕累累，其中有 2000 余人之所以能胜利突围，重返前线，主要是有皖南人民的大力支持，千方百计地予以掩护、帮助。皖南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帮助新四军的事例不胜枚举，充分表现了军民鱼水深情。皖南人民这种舍生忘死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有不少人当了干部，做了官，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权力，架子越来越大了，群众观念越来越淡薄了。我们要提醒这些人，千万不要忘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巨大贡献的广大人民群众，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权力是广大人民群众给的，千万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忘记了这些,就意味着背叛,就没有资格谈“三个代表”。

总之,在纪念皖南事变 60 周年的时候,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总结经验教训,继承发扬革命传统,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把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铭记血写的历史

童小鹏

1940年10月,正当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对日、伪紧张作战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头子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于1940年10月19日,发出“皓电”,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敌占区去,开始了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6日至13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安徽南部茂林地区,以8万大兵围歼正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扣。1月17日,蒋介石又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要把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皖南事变把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两党关系被推至破裂的边缘。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政治进攻、军事防御”的正确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得到国内的广大同情,使蒋介石政治上处于被动和孤立地位,迫使他不得不在3月的国民参政会上收兵,使紧张的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皖南事变,已过去60年了,但对这一场斗争的历史不应该忘记。我和参加过当年斗争的老同志不会也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中青年同志也应该学习这段历史,以便了解和懂得任何一次革命斗争的胜利,都是要经过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才能取得的,并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新的世纪里,战胜前进道

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任务。

在皖南事变 60 周年到来之际,我向读者介绍我所知道和经历的一些情况。

(一)蒋介石是制造反共高潮的罪魁祸首

1938 年冬,武汉、广州相继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把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和军事委员会都搬到重庆大后方。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广大的占领区,就集中力量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蒋介石屡次要求中共同国民党合并的“溶共”政策遭到失败后,就采取“限共”、“反共”的方针。

1939 年 1 月 21 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共党实施方案》等反动文件,决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自此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就接连在各地制造了许多反共摩擦事件。

6 月 11 日,国民党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袭击冀中抗日根据地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捕杀指战员 400 多人。6 月 12 日,国民党杨森部包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杀害新四军参谋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 6 人,并抢走枪支、现款等。9 月,国民党湖北保安司令程汝怀部,在鄂东新集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群众 500 多人。11 月 11 日,河南确山县国民党县长许公超率武装 1800 多人,进攻确山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残酷杀害、病、残废人员及工作人员 200 多人。

以上事件,虽经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和重庆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及时向蒋介石、何应钦等报告及抗议,要求立刻制止并查办肇事负责人,但蒋介石等反而颠倒黑白,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先向他们进攻。对各地反共事件不仅不加以制止,而且任其继续

发展,自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摩擦,主要是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山和山西。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河北的朱怀冰对太行山根据地,山西的阎锡山对晋东南、晋西北的八路军,进行多次的武装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对我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也进行破坏和镇压。

为了及时掌握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军事、外交动态,重庆南方局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加强了情报工作,并及时地报告党中央和提出各种建议。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很重视重庆的情报和周恩来的意见,及时地征求了八路军、新四军前线首长的意见,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并通知全党贯彻执行,使我党我军立于不败之地。

早在193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对待局部武装冲突的原则的指示》,指出:在日寇挑拨与国民党反共政策情况下,局部武装冲突有加多的趋势;我们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可以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影响统战,另一方面在自己的立场上,给武装摩擦者向我进攻的行动以应有的坚决的打击与教训。

9月16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家记者并发表谈话。在回答两党摩擦问题时,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指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三条路好走。

由于全党全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把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都打退了。

与此同时，延安的新华社将事实向国内公布，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及时向国民党抗议，并用口头、文字的多种方式将事实向国内外宣传，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被动，中共得到国内的广泛同情。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失败，政治上受到谴责后，不得不暂时收场。但他并不甘心，他在等待时机，积极准备掀起更大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二）蒋介石制造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

1940年夏季的国际形势有很大的变化。6月，德国希特勒派大军攻占法国巴黎，法国贝当政府投降；英军退回本土。9月27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正式结成三国轴心。在这之后，英、美也组成同盟国。日本在德国支持下，由德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劝蒋介石政府向日本妥协投降，共同反共。英美为了使日本拖在中国战场不能对太平洋地区出兵，也积极拉拢蒋介石参加英美集团。10月8日，英国开放了已封锁三个月的滇（云南）缅（缅甸）公路，让战争物资运到云南，并给蒋介石政府1000万英镑贷款。美国也宣布分三次给蒋介石政府7500万美元贷款。苏联虽因准备对付德国进攻，对华援助减少，但还是有帮助。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得意忘形，认为国际形势对他有利，不仅加紧对我地下党破坏，还要对中共领导的军队下手。

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1939年初就从苏南茅山根据地向北发展，经扬中北渡长江，经过同日军和伪军多次战斗，在江苏泰州地区的黄桥附近建立了根据地并扩大了部队。但是国民党的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不去打日本和汉奸，却在蒋介石指使下，于1940年9月，数次向陈毅支队进攻，都被挫败。韩德勤不甘失败，又于10月1日亲自指挥26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黄桥地区进攻，想把新四军部队消灭。陈毅等早有准备，就集中力量进行英勇反击，经过三天激烈战斗，歼灭韩部1万多人，击毙

其军长李守维和旅长翁达,打退了韩德勤的进攻。

韩德勤在黄桥惨败后,蒋介石更加紧策划对新四军的全面进攻,把第二次反共摩擦推向高潮。

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叶剑英参谋长即转朱、彭总司令和叶挺军长(因19日电文韵中代号为皓,史称“皓电”),电文中颠倒黑白地列举了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四条罪状: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同时,以命令口吻,限电到一个月內,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这份电报,实际上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

叶剑英收到何、白的“皓电”后,即同周恩来一道到红岩召集南方局紧急会议,周恩来把电报向到会同志念完后,即把电报交给我立即用最急电报党中央。并叮嘱,从现在起,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要24小时有人值班,电报随时译发。我当即召集机要人员开会,说明政治形势紧张,每个同志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保证同党中央的联系不中断,及时收发电报;同时要高度警惕,防止国民党特务的袭击,以生命保护党的机密。

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同志,认真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同时布置南方局各方面的工作,除了指示地下党坚持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外,特别强调要加强各方面的统战活动,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动态报告党中央。

10月24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指出:“根据各种迹象表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19日电告表示了国方决心。”周恩来认为,我们对“皓电”的原则和办法决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并指出:“国民党方面整个计划意在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同时就新四军的行动问题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皖

南新四军主力北移,让出江南,到江北坚持斗争;第二方案是,皖南新四军一部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就地打游击,但江北的部队不论怎样都要做应战的准备。

10月2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发来急电,指出:尽管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

周恩来、叶剑英一面抓紧内部工作(通知地下党组织准备应付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加强组织纪律、保密教育),同时开展统战工作,把何、白“皓电”向国民党元老派冯玉祥、于右任和左派屈武、王昆仑等通报,又同民主党派负责人打招呼,还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11月1日,周恩来向党中央发电,同意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并报告了国民党元老派和民主党派一些负责人的意见:“他们一致希望我们拿出办法,并希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特别转达了冯玉祥的建议:“要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周恩来又建议党中央“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何、白”,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可以移到江北,但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

11月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今日会议,讨论东日(1日)来电,仍主表面缓和,实际抵抗。”3日,毛泽东又电周恩来,说明中共政策是“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随后,毛泽东又电周恩来、叶剑英:“在此情况下,我之方针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至此,党中央对蒋介石斗争的方针、策

略就制定下来了。

党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于11月9日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对何白“皓电”作公开的答复,这便是“佳电”。“佳电”一方面坚决驳斥“皓电”对八路军的造谣和攻击,另一方面又采取缓和态度,申明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将江南正规部队“遵命北移”,“对于江北部队暂时拟请免调”。“佳电”同时警告国民党当局不要造成“我作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莫及”的不幸局面。

为了使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了解当前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国共关系的事实真相,周恩来、叶剑英和南方局、八办、《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都根据党中央精神开展对各党派、团体、各界人士的宣传解释工作。周恩来专门拜访国民党的孙科、冯玉祥、于右任、覃振等元老,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事件、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并阐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基本立场。

经过工作,中共团结抗战的诚意和合情合理的立场,得到了广大中间力量的同情。

为了使国际友人和记者了解当时中国的形势,周恩来和王炳南、陈家康、龚澎等外事组同志,又同各国驻重庆的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广泛接触。当美国进步女作家斯特朗从苏联经重庆回美国,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亲自同她长谈了几个晚上,向她详细地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历史和现状及国民党顽固派两年来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的真相,指出他们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反共事件和战争。谈话结束时,周恩来嘱咐斯特朗: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到时我会捎信给你,信到后才发表。同时,叶剑英领导军事组同志,把半年来国共双方来往电文和国民党的反共文件等,编成小册子,由新华日报社秘密印刷,在重庆秘密散发并托人带到桂林、昆明以及香港,在国内外进行宣传,为皖南事变爆发后的宣传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这是周恩来政治预见性的表现。